

7,870亿 美元的 问题

莫琳·伯克对美国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前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的采访

克里斯蒂娜·罗默在2008年11月意外地收到一封邮件，发邮件的人想和她谈关于新当选总统的过渡班子问题，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理睬。她想，这个人也许认为她与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有关系，想让她帮忙找个工作。

但她的丈夫戴维（是和她一起工作的一位经济学家）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发件人迈克尔·弗罗曼的信息，然后对克里斯蒂娜说：“你也许应该给他打个电话，他是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新政府过渡期间经济工作班子的负责人。”

罗默和她的丈夫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也都是奥巴马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克里斯蒂娜（朋友称呼她“克里斯蒂”）除了为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奥斯坦·古尔斯比准备过一些简报备忘录以外，并没怎么参与过竞选活动。所以当她在芝加哥会见候任总统奥巴马，讨论由她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事时感到很惊讶，她说：“那次经历很离奇而且还有些令人胆战心惊。”

会见发生的背景是，美国财政不稳定情况持续上升，从抵押信贷市场扩散开来，几乎导致全球恐慌。两个月

前，最大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在美国历史上是最大的公司破产事件。几周后，纽约股票交易市场遭遇了几十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信贷市场被冻结。接下来劳动统计局报告指出，十月份美国丧失了24万个就业机会，这是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的信号。

会谈一开始，奥巴马就说货币政策已经起不到解决经济危机的作用了，因此采取财政政策是唯一的选择，该政策包括税收和消费两个方面。虽然罗默同意财政刺激是必要的，但是她的学术身份让她不得不对总统说法的前提表示异议。她告诉总统：“即使利率率降到接近零，美联储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它仍然有许多事可以做。”罗默研究过货币扩张政策是如何使美国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根据她的研究，两人谈到了政府可采取的手段，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75年前做了什么正确的决策。罗默回忆说：“我很惊讶奥巴马对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知道得如此之多，与他的讨论也是难以置信的理智。”

奥巴马当场就请她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她也当场接受了。11月30日，仅仅在选举的三个半星期后，她就去了华盛顿特区。接下来的一个

月格外混乱匆忙，因为他们得举家搬迁、给戴维找工作、给他们最年幼的孩子 12 岁的马修找学校、租房子。

后来罗默问拉姆·伊曼纽尔，时任奥巴马的幕僚长，为什么找她担任这个职位。现任芝加哥市长的伊曼纽尔告诉她：“这很简单。你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我们想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专家。”

把“金子”变成“铅”

像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那样，罗默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大萧条的起因和对大萧条起作用的政策。虽然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货币政策上面，但是研究结果还是让她相信政府对稳定经济有作用。所以自大萧条后，国家面临最糟糕的经济危机期间，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罗默主张政府迅速行动从而形成了 2009 年巨大的刺激计划，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默对经济衰退问题感兴趣，部分原因是来自她的个人经历。她生于伊利诺伊州奥尔顿郊区的圣路易斯。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教师，后来随家庭搬到了位于美国工业中心、俄亥俄州的制造业重镇坎顿。20 世纪 70 年代上高中的时候，她目睹了该区域经济下滑的状况，伴随而来的就是 1973 年石油价格暴涨，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她说：“经济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看到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因此让我觉得研究经济问题很重要，”这促使她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和玛丽学院上学时把经济学作为她的主修课。

1983 年春天，罗默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她亲身感受到了经济衰退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她父亲失业，不久后母亲又听说自己的教师工作下一年要被解除。多亏了赫赫有名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罗默的学习经费才有了保障。但是她担心经济衰退会影响她和同窗好友戴维·罗默准备在当年八月份举行的婚礼。她父母安慰她说为了她的婚礼存了钱，而且她妈妈和姨妈们都投入进来帮忙准备婚宴和鲜花，婚礼得以如期举行。但是她仍然说：“这是一个影响重大的成长经历。”

罗默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专家彼得·泰明讲授的一节课上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作为特明教授的 research assistant，罗默开始对历史数据着迷。当时在宏观经济学家中流行的看法是：二战后美国的经济要比战前几十年里稳定得多，因此导致许多人断言决策者们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货币和财政手段来稳定经济。但是收集和计算诸如实际 GDP 和失业率等宏观经济表现指标的现代技术，从二战后才刚刚兴起。用来做比较的战前的经济数据大多是通过把一些假设数据拼凑起来得到的，结果就很难说究竟是商业周期真的变了，还是只有数据结构变了。

因此，凭着她反直觉的才华，罗默将战前用来计算失业率和产量的方法用于统计战后阶段的经济数据，此法被泰明教授称之为“反向炼金术”。她是把“金子”（良好的战后数据）变成“铅”（用得到战前数据同样的方法创造的战后数据），而不是把“铅”变成“金子”。这项研究为她的博士论文奠定了基础，而且揭示了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经济状况几乎与二战前几十年（不包括大萧条时期）里的同样不稳定，这显然违背了传统观点。

罗默说：“对宏观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的简单描绘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数据。”

劳伦斯·鲍尔，罗默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经济学。他说罗默的论文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她的论文使一些人受到威胁，因为她动摇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是件好事的依据。”他回忆说，“这的确有些讽刺意味，因为罗默如今正是经济刺激及积极政策的倡导者。”

罗默在后来的很多论文中辩解道，经济缺乏稳定并非说明货币和财政政策不重要，而是问题出在没有利用好这些工具。过度的经济扩张政策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导致利用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罗默说，“战后初期，很多研究都在继续。”

她说，那些年代和那些人让就学于麻省理工学院无比令人兴奋。美联储实施了专为消除 20 世纪 70 年代末高通胀而设计的货币紧缩政策之后，国家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罗默回忆说：“当宏观经济变得很脆弱时，我们直接地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她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杰出的教职人员的认同，如史丹利·费舍尔和已故的卢迪格·杜布斯（杜布斯与泰明教授同时担任她的论文顾问）以及周围的同学圈子，其中就包括鲍尔和格雷戈里·门克维，门克维现任哈佛大学教授，是在罗默之前担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罗默夫妇 1985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他们转去了伯克利大学。

记叙法

罗默的研究大部分是和她丈夫一起完成的，研究反映出她早期对经济史的强烈爱好。他们工作的一项基本特征就是使用“记叙法”，即不仅从统计中找证据，而且从历史中找证据。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他们 1963 年的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 年》中首先使用了这种方法。

在一篇 1989 年发表的影响深远的论文《货币政策重要吗？本着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精神的一项新试验》

全面考虑

罗默说，估计财政政策的影响很困难，因为财政措施常常是为了响应经济中的其他问题而采取的。罗默于2011年在汉密尔顿学院对学生们说，把其他因素的影响与税收变化的影响或者开支决策的影响分开需要复杂的技术，而且要通过有创造性的和辛苦的工作来完成。

以2008年2月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为例，实施该政策的原因是两个月前发生的经济衰退。减税是以2008年4月到7月间寄出的退税支票为主要形式。

罗默说，当退税支票到来的时候，家庭收入明显提高。可是消费并没有增长，反而稍有下降。乍一看，退税似乎没起作用。

但是国会批准退税政策并非无缘无故，它是在次贷危机最严重、房价暴跌时决定的。大多数人的主要固定资产是房子，而当房价下跌时，人们倾向于节约开支，罗默解释说。

“针对此种情况，在退税措施实施期间消费保持稳定也许正说明了退税政策是多么有效，”罗默肯定地说，“虽然房价猛烈下跌，退税却使消费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罗默说，最重要的教训是，不能只看结果就推断退税政策或其他任何政策所带来的效果。你必须考虑到在没有该政策的情况下经济状况的走向。

“经济学家给这个问题起了个名字叫：遗漏变量偏差。”罗默说，“任何时候，当你在观察两个变量的关系时，如：消费者开支和退税的关系，你必须考虑到第三个变量，诸如财富的流失，对前两者都产生影响。”

她特别指出，遗漏变量偏差是经济学实证性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中，罗默夫妇使用记叙法，把战后这一时代划分出七个时段，当时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出于对通货膨胀的忧虑，试图用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放缓。在每个时段中，他们都发现，美联储的政策导致的结果都远远低于政策改变前预期的发展效果，前提是假定货币政策中变化的“决定性证据”对实体经济至关重要。

这项研究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罗默夫妇在划分和分析这七个时段时，详细地阅读了40年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一个会议记录和其他记录，认真领会美联储的目的，了解制定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

虽然运用起来很复杂，但是记叙法比纯粹统计法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提供“附加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解决在研究货币因素与实际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出现的定向问题，”罗默夫妇（国家经济研究局货币经济计划的共同负责人）写道。

最近，罗默夫妇运用这一方法测定了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他们从所有工作中得出一个主要结论：一项政策所带来的效果是无法通过只看结果来推

断的，必须考虑到经济中出现的其他情况以及采取政策的原因（见专栏）。

多少算太多？

在2011年伯克利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罗默告诉毕业生：“在白宫的工作简直就是她从来没有做过的最艰苦的工作，但是那两年对她的一生来说也是最重要而且最有意义的”。那个阶段非常困难，部分原因是她的丈夫不再和她一起共事，丈夫作为访问学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两人就职于不同的机构，不仅停止了每日的合作，而且由于政府的保密纪律，他们甚至不能开口讨论她的工作。她怀念那些与丈夫——一位近30年来她最信任的人——总是就某事展开充分探讨的日子。

每天工作14小时，所做的工作也是难以置信的紧张。刚到华盛顿特区的时候，罗默和奥巴马经济过渡班子的其他成员就立刻开始了工作。2008年12月，她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从各种来源中把作为政策响应出发点的所有预测分析汇总起来，这些信息有的来自美联储，有的来自一些私营机构的分析师。然而几乎所有这些预测分析都低估了新政府即将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只是眼看着这些预测分析显露的状况在眼前恶化，”罗默回忆说，“随着得到的数据越来越多，经济衰退的严重性越来越清晰可见。”

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下，奥巴马的新经济团队于11月下旬感恩节假期一过就开始着手计划一项应对政策。这个团队成员包括：受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劳伦斯·萨默斯），财政部负责人（蒂莫西·盖特纳），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负责人（彼得·奥斯泽），以及罗默。大家都同意，经济需要一套刺激措施，但对具体达到什么规模才合适仍有争论。

诺姆·希伯在他《逃跑的艺术家——奥巴马团队是怎样摸索恢复经济的》一书中讲述，罗默估计一套刺激措施（包括：消费、税收以及联邦与地方的分配）需要1.8万亿美元，才能全面消除经济正在生产什么和有潜力生产什么之间的差距。这些推算促使了这套刺激措施规模的增大，但是，只有四项方案（涉及金额范围从5,500亿美元至8,900亿美元不等）被写进了经济团队致奥巴马总统的备忘录中。

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即：7,870亿美元财政刺激法案。虽然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财政刺激措施，但只是罗默提出的1.8万亿美元的一半。

罗默承认，因为危机的严重性是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个较小的刺激措施也许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选择。

然而，现在看来很清楚：“更多（超过 7,870 亿美元）的刺激数目肯定会更好。我们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当时我们没那么有钱。”

艰难的位置

最让罗默对于任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感到遗憾的是，她在 2009 年 1 月与杰瑞德·伯恩斯坦（候选副总统约瑟夫·拜登的经济顾问）一起发表的一篇报告。罗默-伯恩斯坦报告提出了一个支持财政刺激的论据，目的是说服国会和公众相信，强大的刺激是必要的。罗默和伯恩斯坦写到：提议约 8,000 亿美元的一套刺激方案，可保证失业率上升不超过 8%；而如果不采用，失业率则会达到 9.1%。当失业率最后高达 10% 的时候，许多保守派抓住了罗默和伯恩斯坦的把柄，认为这表明了刺激政策没起作用。（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还在争论说，如果没有刺激政策，失业率也许还会上升得更高。罗默和伯恩斯坦的真正错误就在于他们的预测底线过于乐观。）

“缺乏经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形成论据的过程，”罗默说，“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就是提供信息并尽量说明我们为什么建议采取这样一个特殊的政策行动。但当我们在想怎样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应该有更多的政治考量。”

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经过了近两年的艰辛工作，罗默于 2010 年 9 月辞去了她的职位。两年约是这一职位的标准任期。有推测说，她决定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奥巴马政府为时过早的从刺激政策向着重削减赤字的政策转变，使罗默感到受挫。或者是由于与萨默斯的分歧导致辞职。罗默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时就认识了当时在那里执教的萨默斯。但是罗默否认了那些推测，她说她辞职是为了全家可以搬回加利福尼亚去，让她最小的儿子在那里上高中。

“有传闻说，我离开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与拉里·萨默斯相处。所以当我离职的消息宣布后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说，‘不，我非常喜欢拉里·萨默斯；我离职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结果蒂姆·盖特纳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听着，如果你不说些我的好话，他们会认为是我把你轰走的。’”罗默轻声笑着说。

很“酷”的原因

罗默很高兴回到伯克利大学，她的第二个孩子保罗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现在开始在那里读化学博士学位（她最大的孩子凯瑟琳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生物学博士，马修现在读高中二年级）。

回顾在华盛顿特区的那段时期，罗默对同时兼顾

白宫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困难程度惊叹不已。她说：“简直就没有办法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进入过渡班子一个月后，罗默记得，她是在圣诞节前两天才筋疲力尽而且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

罗默回忆说：“我们的两个大孩子回家后，装饰起一棵圣诞树，烤了饼干，而我什么礼物都没有准备，只是说，‘真对不起，’他们回我：‘妈妈，没关系。你让我们变得很酷。’我猜是由于为奥巴马总统工作才弥补了很多。”

回过头看，事实证明：“数目更多（超过 7,870 亿美元）肯定会更好”。

罗默仍然通过星期天《纽约时报》中的一个“财经观察”专栏关注着公共领域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栏目中，她和其他五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交替地撰写文章。目前来看，这样的公众曝光率刚刚好，她说：“我仍然关心许多政策问题，而且专栏像个论坛，人们可以在那里进行认真的辩论、提出依据。”

依然让罗默深感头痛的问题是美国的失业率（2013 年 1 月为 7.9%）。在最近一期栏目里，她探讨了美联储怎样才能使促进增长的政策更有力。她说，目前的失业问题需要大胆的解决方案，例如一条以名义 GDP（经济体的美元总值）为目标的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美联储将承诺不惜一切代价使名义 GDP 回到危机前的轨道上来，以改善对未来增长的预期，即使这意味着放弃目前的谨慎路线。“如果克里斯蒂负责美联储，她会做些非常关键、果断的事，”鲍尔说，“她一直对高失业率的糟糕状况直言不讳，而且说得恰如其分。”

罗默认为，教育民众懂得经济问题很重要。“事实是，无论是讨论货币政策还是财经政策都是很复杂的。”而部分问题是政治家们都倾向于过分简单化。

“他们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减税，而减税就能对付预算赤字。’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同样，民主党人也这么说：‘只要提高对富人征税，我们就可以保持补贴计划。’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富人也没有那么多钱来支付全部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她说。

罗默利用演讲、报纸专栏和她的教学职位，传达她对本国面临的复杂经济挑战的观点。“如果你愿意花时间，以一种让不懂经济的人都明白的方式讲解，我想你最后肯定能成功。”

永远的教师，罗默似乎回到了本应属于她的位置上。■

莫琳·伯克（Maureen Burke）是《金融与发展》编辑部工作人员。